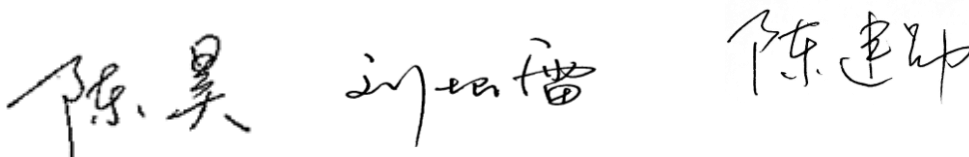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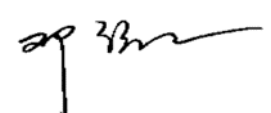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博士科研文献学术水平认定申请表

| | | |
|---|------------|-----------|
| 博士生姓名：赵晓坤 | 学院：国际经济研究院 | 专业：世界经济 |
| 学号：201801110138 | 导师：邓慧慧 | 字数：2.7 万字 |
| 文献题目：产业政策的内涵、理论与政策效应：研究回顾与展望 | | |
| 文献摘要及与学位论文的相关度描述：（500 字以内） <div style="margin-top: 10px;">文献摘要： 产业政策始终是中国理解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窗口。本文首先界定了产业政策的内涵，既有研究关于产业政策的科学量化。在此基础上对产业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微观经济效应、环境效应和社会效应进行梳理和归纳。并进一步深入讨论了产业政策中，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如何影响了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最后，本文对产业政策的政策效应展开述评，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未来研究展望。</div> <div style="margin-top: 20px;">文献综述与学位论文的相关度： 该文献综述紧密贴合学位论文的题目《产业政策的环境效应研究——基于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的政策工具》，梳理了既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找出现有研究的不足，提供了未来研究方向，为学位论文第 4 章理论分析框架、第 5 章至第 7 章实证分析框架做了重要铺垫。</div> | | |
| 三位同行专家认定意见 <div style="margin-top: 10px;">该科研文献综述与论文题目密切相关，内容详实充分，归纳凝练准确，综述合理规范，为学位论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实证分析提供了依据，已经达到学术水平认定标准，同意进行博士学位科研成果折算。</div>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margin-top: 20px;"></div> <div style="display: flex; justify-content: space-between; margin-top: 10px;"><div>同行专家签字：</div><div>签字日期：2022 年 4 月 27 日</div></div> | | |
| 导师认定意见 <div style="margin-top: 10px;">经本人及同行专家鉴定，该科研文献已达到学术水平认定标准，建议进行博士申请学位科研成果折算。</div>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margin-top: 20px;"></div> <div style="display: flex; justify-content: flex-end; margin-top: 10px;"><div>导师签字：</div><div>签字日期：2022 年 4 月 27 日</div></div> | | |
| 培养单位审核意见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margin-top: 20px; font-size: 24px; font-weight: bold;">同意</div> <div style="display: flex; justify-content: space-between; margin-top: 20px;"><div></div><div> 主管院领导签字： 签字日期：2022年5月8日</div></div> | | |

产业政策的内涵、理论与政策效应：研究回顾与展望

赵晓坤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经济研究院

内容提要：产业政策是理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窗口，如何集成市场优势与政府优势，寻求二者恰当的平衡点、实现政策有效性始终是学术界与政府关注的焦点。本文在梳理产业政策内涵、界定与理论研究基础上，试图对产业政策的经济效应、环境效应和社会效应进行总结和评论。本文进一步从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综述其对产业政策效应的影响。最后，本文对产业政策的政策效应展开述评，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未来研究展望。

关键词：产业政策 理论基础 经济效应 环境效应 社会效应

政府作用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制定并实施产业政策。如何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使产业政策既能提高生产效率，又能促进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成为各国普遍面临的难题（Crespi et al., 2015; Aiginger, 2016）。因此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各国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

长期以来，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大多集中于政府是否应该实施产业政策，既达成了一些共识，也存在诸多分歧。明确研究对象、界定研究范围既是本文的逻辑起点，也是后续研究的基石。因此本文余下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讨论了既有研究关于“产业政策”涵义与内容，在学术界对产业政策概念普遍认可的基础上明确本文研究对象的具体内容；归纳总结学术界关于产业政策量化识别的三种主要类型。第二部分梳理关于实施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根据已有经验研究表明，产业政策对国家宏观经济以及微观企业行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回顾与整理产业政策的宏观效应与微观效应的相关研究。在新的发展理念下，高质量发展需要统筹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本文关注了现有文献中对产业政策与环境污染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十八大以来，如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成为重要议题，开放竞争市场机制与央地政府互动关系是影响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两种重要力量，第四部分从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深入回顾其对产业政策效应的影响。最后总结梳理已有文献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研究脉络，讨论下一步研究方向和研究空间。

一、核心概念及界定

（一）产业政策的内涵

“产业政策”一词广泛应用于国家发展规划、政府报告、学术研究和新闻媒体报道中，不同情境下“产业政策”内涵与外延指代不同。产业政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汉密尔顿扶持战略新兴产业政策、李斯特保护幼稚产业的主张以及格申克龙关于赶超战略理论(Stiglitz, 2015; Altenburg and Lütkenhorst, 2015; 周建军, 2017)。不同时期, 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曾运用过各种形式的产业政策, 由于经济水平、文化背景和制度体制不同, 各个国家或地区在制定产业政策发展目标、采取政策工具、选取政策作用对象都有所差异, 学术界对产业政策的解读也随之改变。日本学者小宫隆太郎等(1988)认为产业政策是影响产业资源配置和企业经营活动的政策集合, 产业政策既包括宏观经济政策, 也包括传统的微观经济政策领域(Sharp, 1998)。中国学者周叔莲(1987)、周振华(1991)、刘鹤和杨伟民(1999)定义产业政策是影响产业结构、产业发展和产业经济活动的政策总和, 周林等(1987)将产业政策视为政府宏观管理重要手段, 在市场机制基础上重点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提高产业结构高度化。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政策专题研究组(1987)建议产业政策要与发展和改革的阶段性和适应性, 通过协调财税金融、外贸外汇、技术和人才等政策形成产业体系, 发挥资源配置与宏观经济调控作用, 探索如何搞活企业和提升生产效率。Lee et al. (2012)认为产业政策涵盖了制度环境、技术进步、鼓励性政策三个层面, 张维迎(2016)则强调了产业政策还具有“私人产品生产领域”与“选择性干预或歧视性对待”的突出特点。学术界普遍认可世界银行(1993)的提法, 产业政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了全局发展和长远经济利益对产业实施保护、扶持或调整等手段, 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看, 产业政策是政府为了实现经济或社会目标所制定指向产业的政策总和(下河边淳和管家茂, 1982; Warwick, 2013; 江小涓, 2014; 韩乾和洪永淼, 2015; 林毅夫等, 2018), 政策目标涵盖了提高生产效率、提升竞争力、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发展、增强市场竞争秩序等(OECD, 1975; Johnson, 1982; Beath, 2002; Rodrik, 2004; Pack and Saggi, 2006; Hatta, 2016; 黄少卿和郭洪宇, 2017)。本文亦采用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定义, 认为产业政策是政府为促进产业在该国或该地区发展而主动采取直接或间接干预特定产业或特定企业的一系列政策总和, 影响资源在产业间和产业内的流动配置。

产业政策包括政府出台与产业有关的政策总和, 具体包括但不限于市场准入限制、关税保护政策、非关税壁垒、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信贷资金优惠、土地价格优惠、出口加工区、国有制等(Robinson, 2009; 林毅夫等, 2018; 江飞涛等, 2021)。从产业政策内容来划分, 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产业布局政策、地区产业政策以及对外开放产业政策(刘鹤和杨伟民, 1999)。从产业政策的目标导向和政策对象来划分, 政策有纵向选择性产业和横向功能性产业两类(Lall, 1994, 2004; Warwick, 2013; Altenburg and Lütkenhorst, 2015)。选择性产业政策以挑选赢家为目的对微观经济主体进行干预, 功能性产业政策以完善市场制度、弥补市场失灵为主导, 增进了市场机能, 拓展了市场范围。从产业政策发布主体、政策效力划分, 美国和德国的联邦政府由国会制定产业政策, 联邦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实施, 州政府负责制定区域产业政策; 中国产业政策主要由国务院发布规划纲

要、指导意见为主要形式的战略性产业政策，各部委颁布实施指南、调整制定的具体产业政策，以及地方政府发布的产业政策规划、条例、法规和政策实施方案等。新结构经济学还将中等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分为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弯道超车型、战略性新兴产业五大类（林毅夫等，2018）。

（二）产业政策的界定

科学量化产业政策是评估政策实际效果的重要前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通过实施多轮产业政策实现经济复兴、产业转型与经济发展，中国实施的产业政策主要学习于日本。1989年3月中国发布《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国发[1989]29号），制定产业发展序列目录作为各地执行产业政策的主要依据。产业政策贯穿了国家“九五”到“十四五”发展规划，成为经济管理和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中国政府采取产业政策主要工具包括目录指导、投资核准（审批）与市场准入、强制淘汰落后产能或强制关停产能、土地政策、财政补贴、政府出资的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税收优惠、政策性贷款、政府采购、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江飞涛等，2021）。根据已有研究中国产业政策量化方式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主要类型：

第一类是根据国家或各省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后文简称“五年规划”）、国家发改委公布产业政策文件、国家振兴发展计划、十大产业计划、国家改革试验区的主导产业等政策文件。“五年规划”制定了国民经济发展远景目标和前瞻性规划，同时也是制定产业政策的基础，以政府五年规划文本为基准的相关研究侧重于政策的长期影响（赵婷和陈钊，2019；2020）。学者一般遵循以“五年规划”为蓝本构建限制性产业、一般支持产业、重点产业政策等虚拟变量刻画政府对待不同产业的政策态度和扶持力度（宋凌云和王贤彬，2013；吴意云和朱希伟，2015；杨继东和罗路宝，2018；张莉等，2019；毛其淋和赵柯雨，2021；郭飞等，2022）；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针对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产业政策，针对“大力发展”“鼓励发展”“积极发展”“调整”等积极态度词语视为鼓励政策。还有部分学者，如钱雪松等（2018）运用2009年中国出台钢铁汽车、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产业振兴规划冲击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陈钊和熊瑞祥（2015）、张鹏杨等（2019）将国家设立出口加工区当年设定为重点发展的主导产业作为产业政策的虚拟变量；21世纪以来，政府设立产业引导基金、产业发展基金为主要形式的产业投资基金成为中国产业政策的重要工具，胡凯和刘昕瑞（2022）以产业投资基金进入与否和投资比例来刻画产业政策。

第二类是根据产业政策文本内容进行分析构成产业政策变量。韩乾和洪永淼（2014）以《国务院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刻画政策所支持的新能源、装备制造、新兴技术等七个产业板块。韩超等（2017）通过整理梳理中央层面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有关的政策获得416项政策文本，将产业政策分为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韩永辉等（2017）从发展型政府视角，通过地方政府密集出台和实施与产业相关地方法规、规范文件和行政法

规等累计数予以定量识别产业政策。洪俊杰和张宸妍（2020）通过加总对每个企业支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数量度量产业政策，运用文档长度修正的词频—逆文本频率指数方法分析判断政策文本传递，获得政策文本权重作为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支持力度。陈璐怡等（2021）根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纺织工业领域正式出台有关环境保护方面 104 条政策文本，识别出南通、青岛、宁波、苏州、济南等 14 个城市以纺织行业为代表的重污染行业实施了绿色产业政策。汪海建等（2022）利用中国供给侧改革中“去产能”政策文件识别受政策影响的行业构建试验组与对照组。

第三类是以产业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使用政府补贴、税收优惠或减免、信贷补贴等政策工具作为产业政策的代理变量。Aghion et al.（2015）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补贴优惠、税收优惠和低息贷款三个维度衡量地区-年份-行业层面产业政策扶持力度，从国家层面使用关税作为产业政策的代理变量。孙早和席建成（2015）、席建成和韩雍（2019）、郑安和沈坤荣（2018）、白极星和周京奎（2018）等通过“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信贷补贴”和“直接研发补贴”等多种变量度量产业政策。周燕和潘瑶（2019）通过政府补贴和税收减免研究新能源汽车政策。戴小勇和成力为（2019）从微观企业、中观产业和宏观地区三个层面构建产业政策实施对象与扶持力度的指标，企业层面采用是否获得补贴构建政府补贴的虚拟变量，以企业间离散程度作为行业层面产业政策指标，地区层面通过产业政策与行业竞争程度相关的指标。赵婷和陈钊（2020）以企业层面获得的补贴加总到地区层面作为度量短期产业政策指标。Howell and Anthony（2020）根据 Fisher 函数并结合补贴、免税和企业获得低息贷款构建衡量企业层面产业扶持的评分指数，通过该指数综合反映产业政策中支持当地企业最直接的相关信息。

政府出台的产业政策往往以政策工具的形式来实施，本文沿袭 Aghion et al.（2015）等多位学者的做法，将产业政策量化为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工具，一是因为政府补贴伴随着中国政府实施持续而广泛的产业政策，补贴手段具有直接性和便利性，是产业政策的基础性工具（宋凌云和王贤彬，2017）。税收优惠是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其具体方式大致包括投资税收优惠、出口税收优惠、小微企业税收减免、鼓励企业购买环保设备和引进环保技术投入税收优惠、企业创新研发投入加计扣除等。二是因为该政策工具数据可以充分利用中国较为完整的工业企业数据库根据行业代码加总，通过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衡量产业政策力度，易于量化比较分析、且对产业发展具有明确指向性。

二、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

（一）市场失灵理论

亚当·斯密指出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能够自发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政府不应对经济加以干预。但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全、经济外部性的存在，导致市场配置资源存在扭曲、浪费等缺陷，需要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对资源配置和产业发展进行干预，

以弥补市场缺陷、纠正市场失灵，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福利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均认为，在资源配置问题上，市场与政府之间互不独立，政府干预经济发展是稳定宏观经济、弥补市场失灵的必然选择。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市场经济体制不够完善，信息不对称、公共物品、经济外部性等失灵现象具有普遍性，政府制定和实施合理的产业政策有利于弥补市场不足，进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Rodrik，1996）。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弥补市场缺陷，学者倾向于支持政府实施产业政策对资源配置的再干预；因此市场失灵理论是实施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市场的外部性、信息不完全、公共物品以及市场势力等导致市场无法发挥有效价格信号机制配置资源，因此需要政府实施产业政策。小宫隆太郎（1988）强调产业政策就是在价格无法有效配置资源的情况下进行政策性干预。Rodrik（1996）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市场失灵现象，政府实施产业政策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推动经济的增长。Hausman 和 Rodrik（2003）将市场失灵归结为协调失灵和信息外溢两个方面，如果政府采取产业政策可以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升级。林毅夫（2010）认为政府要在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而重要的协调或提供基础设施改进以及补偿外部性的作用，以促进产业多样化和升级。Ambroziak（2017）从新古典主义的角度在市场失灵的基础上界定了现代产业政策目标、工具和预期结果。

（二）比较优势理论

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和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共同构成实施产业政策的比较优势理论基础。其中，静态比较优势理论主要包括大卫·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理论。静态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国在土地、资本、劳动力等国内资源要素供给稳定的条件下，根据要素禀赋确立主导产业，生产、出口本国资源最密集、比较优势最明显的产品而进口本国资源相对稀缺、存在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使本国经济利益最大化。依据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各国政府无需制定和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而只需以本国要素禀赋为基础选择适。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各个国家处在不同的阶段上，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结构，以及由此而具有的比较优势，由于每个国家的发展都是持续不断的，资源禀赋结构也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因而比较优势是动态的。

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主要包括幼稚产业理论、战略性贸易保护理论等。1841年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提出了幼稚产业保护论。李斯特认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应实行不同的关税与贸易政策自由贸易只对英国这样的工业成熟国家有利，而对于德国、美国等欠发达国家则实施保护幼稚产业。筱原三代平（1957）从经济赶超视角支持政府干预发挥后发优势，提出产业基准标准，根据“收入弹性原则”和“生产率上升原则”实施产业政策，产业结构转换能力的高低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腾飞必须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表明一国的产业结构会随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实现从低级到高级的变迁，霍夫曼定理等经济理论对经济发展规律、产业结构

演进趋势的揭示，为各国政府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奠定了基础。发展中国家可以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演进经验，制定和实施本国产业政策，从而为本国产业发展指明方向，促进具有良好发展潜力的产业发展和产业竞争力提升。后发优势理论认为后发国家可以在一系列产业政策保护和支持下达到规模经济而可能发展起新的优势产业，通过获得“后发优势”实现经济上的赶超。20 世纪年代 80 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创立了所谓的“新贸易理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基础上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强调了一国凭借各种补贴和保护手段，扶持本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以加强战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政府积极的产业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扶植起具有未来竞争潜力的产业，主动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实现经济的赶超。

（三）结构主义理论

金融危机后演化经济学融入产业政策研究，拓展了产业政策的内涵和外延，现代产业政策是政府以技术溢出、选择性学习、知识创造为核心，通过将生产要素引向高质量经济活动部门，以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带动整体经济水平提高的各项政策措施（马本和郑新业，2018）。新框架下的创新技术动态理论推动了产业政策发展，创新成为新兴产业政策的核心，促进学习、知识供应、技术升级成为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产业政策重点从静态的资源配置转向动态的资源创造（江飞涛和沈梓鑫，2019）。演化经济理论强调了产业系统动态，政策实施源于解决创新过程中出现的系统或网络失灵问题（systemic or network failures），这些问题既有基础设施、技术锁定、路径依赖、制度转轨或转型问题，也存在微观企业、宏观区域方面动态学习过程中结构性失灵（Malerba, 2002; O’Sullivan et al., 2013）。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经济发展是一个产业、技术、基础设施、制度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有“有效的市场”，也要有“有为的政府”。新结构经济学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以禀赋结构作为切入点研究经济结构及其变迁，主要的理论要点可以概况为解释发展与转型改革的三条基本规律：结构变迁规律、结构转型规律、结构变迁与转型中政府作用的规律的十大原理（林毅夫和付才辉，2016）。十大原理主要内容概括为，原理一禀赋结构的供给原理，在给定时间，任何分析但愿的禀赋要素及其结构是给定的，但会随时间而变化，禀赋结构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起点。原理二禀赋结构的需求原理，不同生产方式（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会产生不同的禀赋要素及其结构需求。重工业主导的产业结构对资本相对劳动的需求高于轻工业主导的产业结构。发明主导的技术结构对资本劳动的需求高于模仿主导的技术结构。原理三禀赋结构的相对价格原理，禀赋结构的供求均衡决定了禀赋结构的相对价格，其与禀赋结构与生产结构存在对应关系。原理四最优生产方式原理，不同生产方式的选择会产生不同的收益，最优生产方式的选择是其成本与收益权衡的结果。其揭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比较优势观点，当一个劳动相对资本充裕的发展中经济体，其符合比较优势的生产方式应该是劳动密集型，反之对于资本相对充裕的发达经济，其符合比较优势的方式应该是发展资本密集型。原理五结构变迁循环累计因果原理，动态中，禀赋结构与生产结构互为循环累计

关系，禀赋结构变迁驱动生产结构变迁，生产结构变迁反过来驱动禀赋结构变迁。原理六结构变迁中政府因势利导原理，政府需要发挥因势利导降低交易费用，将潜在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的比较优势。原理七结构变迁中政府最优干预原理，在全球竞争背景下，后发优势所蕴含的发展机会或潜在比较优势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即便是理想的产业政策在获得发展机会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因此需要政府权衡干预的代价和收益。原理八自生能力原理，企业自生能力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基础，企业在开放、自由、竞争市场上获得正常利润的生产者具备自生能力，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面临亏损，理性的企业不会选择偏离最优的生产方式。原理九最优转型原理，转型（改革）的本质是消除各种不利于发展的扭曲，最优的转型方式是其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原理十生产结构的供求原理。不同生产方式要求不同的上层建筑，不同的上层建筑对生产方式产生的功能不同，相互匹配的安排是最优的上层建筑安排。最优生产结构的不同特征性质维度要求与之相对应的最优其他结构安排。

三、产业政策效应的相关研究

本文主要梳理了关于产业政策效应的相关研究，一类文献研究主要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配置效率等宏观方面给出了相关的经验证据，另一类文献主要从微观企业出发，研究企业技术创新、生产效率和投资行为等。本节将以此为基础分析有关产业政策对宏观经济和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探讨已有文献的关于变量选取以及实证方法，通过分析产业政策的实证结论与影响机制，为下文研究寻找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一）产业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

1. 产业政策的增长效应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曾运用产业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国家竞争力(Branstetter and Sakakibara, 1998; Harrison and Rodríguez-Clare, 2010; 林毅夫等, 2018)，政府主导型产业政策助推了经济发展，这一研究结论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亚洲国家得到了验证 (Johnson, 1982; Amsden, 1989; Kim and Lau, 1994; Wade, 1990; Rodrik, 2004)。二战后四十余年，日本 GDP 年均增长率达到 6.7%，中国台湾、中国香港 GDP、韩国和新加坡平均增长率高达 8% 左右 (Kim and Lau, 1994)，实施赶超型产业政策充分发挥了后发优势，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创造了东亚奇迹 (沃格尔, 1985; 南亮进, 1992; Robinson, 2009)。Little (1982) 认为日本经济成功源于有效实施了产业政策，Wade (1990) 考察中国台湾的产业政策，证实了产业政策的增长效应存在。合理的产业政策能够有效弥补市场负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等不足，实现经济增长 (Lin and Rosenblatt, 2012)，提升工业竞争力 (Lall, 2013)。

从理论模型上，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 构建了两个国家单要素三部门的理论模型，国家对技术部门的补贴使该国逆比较优势进行产品生产，技术积累最终转化为逆比较优势并在停止补贴后能够继续维持比较优势，形成经济加速发展。Greenwald et al. (2006) 构建

了包含工业和传统两部门模型，贸易保护政策增进长期生产率带来的福利会大于短期本国低效率工业部门生产带来的损失，因而贸易保护产业政策对长期经济发展是有利的。Harrison et al.（2009）采用李嘉图模型发现，保护新兴产业政策具有动态比较优势或正外部性使得国家整体收入提升。Aghion et al.（2015）采用两期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实施于竞争行业的产业政策促进竞争，带来行业产出和创新的增加。黄先海等（2015）基于拓展的两部门两企业伯川德模型，证实产业政策实施受限于最优空间和有效竞争阈值，偏离竞争阈值补贴会降低企业对行业竞争压力的敏感性。周亚虹等（2015）通过企业反应模型检验政府对产业政策的传统干预方式，能够促进新能源等产业健康发展，产业政策需要向培育企业创新和新型需求转变。郑安和沈坤荣（2018）构建包含研发部门、中间产品、最终产品、居民和政府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发现以研发补贴形式的直接产业政策并不能提高平衡经济增长路径上的经济增长率；税收补贴、信贷补贴等间接产业政策能够提高平衡经济增长路径上的经济增长率。Liu（2019）构建生产网络模型，研究发现市场失灵和需求链传导会导致上游产业扭曲最大，因此产业政策对上游产业最有效。

在实证检验上，宋凌云和王贤彬（2016；2017）通过中国 1999-2007 年制造业样本数据证实了产业政策的增长效应是存在的，这种增长效应在不同产业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可能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对传统产业、重点产业和支柱产业之间的信息掌握程度差异，从而使得地方政府在识别与扶持产业的能力不同。赵卿和曾海舰（2017）利用产业政策文件数量度量产业政策，结论证实了中国产业政策在推动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对制造业绿色发展效果甚微。Mao J.et al.（2021）结合中国工业和科技政策的原始数据集和企业的原始数据集证实了中国产业政策确实成功。

也有学者对产业政策能够促进产业增长提出质疑。Kruger and Tuncer（1982）研究发现土耳其的贸易保护政策并没有起到保护本国幼稚产业作用；经济发展更多是因为实施了对外开放、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和贸易政策（Krugman, 1997；Lawrence and Weinstein, 1999）。产业政策频繁使用是导致产能过剩的原因，寇宗来等（2017）研究发现产业政策中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因政策扶持和所有制性质存在非对称性，鼓励类产业政策更容易导致产能过剩和国进民退效应。越来越多学者认为产业政策能否促进经济增长还取决于多方面机制，江小涓（1993）结合中国实践对产业政策能否促进经济发展取决于几种因素，第一，产业政策发挥需要市场基础作用；第二，政策工具本身是否有效；第三，是否存在政策阻力；第四，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是否融洽。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强调运用“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选择和实施产业政策，通过发挥比较优势促进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Page and Tarp（2017）指出非洲等其他欠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效果不尽人意，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治理能力以及市场经济不完善。

2.产业政策的结构效应

衡量产业政策的结构效应关键在于如何量化产业结构优化或产业结构升级，现有研究中，支持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学者居多。李力行和申广军（2015）通过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库研究发现设立开发区产业政策能够促进制造业内部产业结构，如果产业政策符合地区的比较优势，这种正向积极作用更为明显。韩永辉等（2017）将产业法规作为产业政策的代理变量，研究发现中国省级地方政府的产业法规显著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化，政策与市场协同互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市场化是政府产业政策引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基础；政府效率和政府治理能力是产业政策贯彻执行的必要支撑。周茂等（2018）通过构造产业技术复杂度衡量地区制造业升级，证实了中国设立开发区的产业政策通过集聚效应、资本深化和出口学习三条机制推动了地区制造业升级。林毅夫等（2018）认为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后段，根据“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两轨六步法甄别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不断学习、模仿以及获得溢出效应，实施相应的产业政策降低交易费用使其成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彭伟辉和宋光辉（2019）认为无论是功能性产业政策还是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中国产业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策效应因市场化水平而异。

3.产业政策的效率效应

关于产业政策能否提升产业效率，学者给出了不同结果的经验证据。Krueger and Tuner（1982）使用土耳其 1963-1976 年二位代码制造业产业层面数据和银行贷款数据，使用关税、配额和投入产出表构建了产业有效保护率指标和企业、产业层面投入产出比增长率衡量产业政策效果，研究结果发现保护关税产业政策并没有提高相应行业的效率。Beason and Weinstein（1996）利用 1955 年-1990 年日本产业部门数据得出相同的结论，产业政策对生产效率没有起到积极提升作用。Restuccia and Rogerson（2008）认为政府补贴扭曲了资源配置效率，从而降低了行业生产率。宋凌云和王贤彬（2013）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通过整理中国“五年规划”中提及的重点产业政策信息，重点产业政策总体上有利于产业效率提升，这种提升作用对与国家规划不同的地方支柱产业效果最显著，其次是传统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存在生产率排序效应。杨露鑫（2021）通过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检验了政府补贴与生产率之间存在倒 U 型的非线性关系。

（二）产业政策的微观经济效应

1.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可能存在挤入、挤出或者中性效应，学者从正反两方面给出了理论解释与实证证据。产业政策通过政府补贴、税收减免或市场准入等政策工具缓解了企业在创新过程中面临的激励不足或者融资约束，受扶持企业传递出代表发展方向、新兴产业信号，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范蕊等（2020）认为税收优惠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孙文浩等（2021）研究发现向科研和效率型企业减免税收的倾向性政策不仅有利于激发企业创新活力，还能让“僵尸企业”起死回生；余典范和王佳希（2022）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的创新影响，补贴能够激励成长期的企业创新投入，而对成熟期和衰退期的企业创新意愿影响甚微。而韩凤芹和陈亚平（2021）给出了相反的证据，税收

优惠对企业创新意愿、谋取市场技术认可的作用并不明显，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研究发现产业政策促进了企业发明专利申请的显著增加，而创新质量没有有效提升。Boeing（2016）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存在短期挤出效应，而长期不存在明显的挤入或挤出效应。吴武清等（2020）认为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挤出与挤入效应并存，挤出效应会逆转为挤入效应。Dai and Cheng（2015）、张杰（2020）发现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 U 型关系，毛其淋和许家云（2015）、杨晓妹等（2021）、于建忠和陈燕红（2021）证实了补贴具有门槛效应，补贴强度存在一定的适度区间。吴伟伟和张天一（2021）强调了补贴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是非对称的，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产出影响是倒 U 型的，而非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产出的积极作用。

2.产业政策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学者关于产业政策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尚无一致结论。部分学者持正面积积极观点，如任曙明和吕镛（2014）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具有平滑机制，够抵消融资约束对装备制造业生产效率的负面影响。Aghion et al.（2015）认为科学设计并有效实施的产业政策对市场竞争将产生有利影响，进而提高整个行业的生产率。李政等（2019）研究认为政府补贴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这种作用存在边际递减规律，随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补贴正向作用逐渐减弱，增加企业研发投入能缓解政府补贴作用的下降。谢获宝和黄大禹（2020）以地方政府政策文件数来测度产业政策强度水平，根据中国 2007 年-2017 年上市企业数据发现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强度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成正比，地方政府通过财政科技投入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有效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产业政策不利于企业效率的提升，如张龙鹏和汤志伟（2018）实证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差异化问题，扭曲市场价格机制、拉大了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生产率离散度，导致了资源错配。张莉等（2019）研究发现在 1998-2007 年样本期内，重点产业政策整体上显著抑制了相应行业内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重点产业政策将资源从非重点行业流向重点行业，导致企业过度投资降低投资效率，最终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完善市场价格机制和改善要素市场扭曲能有效缓解产业政策的负面作用。徐保昌和谢建国（2015）给出了政府质量改善产业政策效率的经验证据，政府质量越高补贴的效果显著，随着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补贴的阻碍作用逐渐降低。也有学者认为产业政策的作用有一定适用范围，如邵敏和包群（2012）基于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研究了不同补贴收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补贴效果有阈值，补贴力度小于该临界值则能够促进企业生产率。

3.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融资的影响

产业政策应实质是影响了企业决策以及企业选择，产业政策作用的过程是企业进行资源再配置的动态过程，进入或者退出相应产业的发展过程。关于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投资融资，现有主要从投资水平、投资效率和投资方向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受到产业扶持企业的投资水平相对更高，可能会出现“潮涌现象”（侯方宇和杨瑞龙，2018），邵伟和季晓东（2020）以开发区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开发区政策通过推动通达性水平和经济

增长质量显著提高了企业投资的意愿、扩大企业投资规模。郭飞等（2021）认为产业政策从整体上促进了企业脱需向实，降低了金融资产投资水平。花贵如等（2021）发现不同类型的产业扶持态度影响了投资者情绪，鼓励型产业政策激励了企业投资，而限制类产业政策抑制了企业投资。杨汝岱和朱诗娥（2018）认为产业政策对低效率的企业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而市场竞争程度强的地区，产业政策实施使得高效率的企业能够在市场继续生产。何文韬和肖兴志（2018）以光伏产业政策的波动研究对光伏企业进入、退出以及生存差异性，证实了产业政策促进技术创新显著增加了企业投资，同时降低企业退出市场的风险。吴利华和申振佳（2013）在装备制造业行业中，国有企业受到政府“父爱主义”更多关照接受政府补贴，国有控股小企业生产率较高。王克敏等（2017）研究受产业政策鼓励的公司，地方政府往往为其提供更多贷款和补助，企业投资水平越高、过度投资越严重。与投资规模的积极作用，大部分研究认为产业政策会降低投资的效率，产业政策极易引发投资的“潮涌现象”以及“羊群效应”，进而导致过度投资，产业政策扶持下，企业投资效率普遍降低（白让让，2016；侯方宇和杨瑞龙，2018；徐浩等，2019）。产业政策诱发企业寻租等行为也是降低企业投资效率的主要因素（江飞涛和李晓萍，2010；张杰和宣璐，2016）。

（三）产业政策的环境效应

世界各国政府通过给予低息融资、减少监管、税收减免、价格支持、垄断权和各种补贴来支持特定的企业或部门，关于产业政策如何影响资源配置和环境污染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政府补贴。Van Beers and van den Bergh（2001）粗略估计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全球补贴成本至少为 9500 亿美元，占世界 GDP 的 3.6%，其中农业、渔业、运输和能源产业补贴占 81.5%，制造业补贴占 5.8%，这五个产业补贴影响了 96.7% 的世界贸易量。Brandt and Zhu（2000）报告估计 1993 年中国的补贴占 GDP 的 6.8%。经合组织国家每年提供 4000 亿美元产业补贴，通过补贴控制污染投资政策（拨款、软贷款、加速折旧）和清洁技术或清洁能源的产业政策往往能够降低污染程度（Barde and Honkatukia，2004）。

1. 产业政策与环境污染的理论研究

学者通过局部均衡或一般均衡模型检验了产业政策尤其是补贴对环境的影响，而相关结论的结论尚未形成共识。Van Beers and Van den Bergh（2001）通过局部静态均衡模型展示了在小型开放经济体中，补贴刺激企业生产，产出远远超过社会最优水平，加大排放从而助长了负面福利。如果补贴足够大，一个国家可能会从进口一种对环境敏感的货物转向出口，产量的增加反过来又增加了排放量；补贴传达了与生产成本向左的价格信号加剧了市场失灵，因为补贴边际成本低于边际私人成本，而边际私人成本又低于边际私人成本加上社会成本；非环保目标的补贴由于其隐蔽性导致其对环境无法预见的影响，各种隐蔽补贴影响能源、矿产资源替代性、出口货物技术和国际运输的相对成本而且很难被证实。Bajona and Kelly（2012）通过构建一般均衡模型提供了中国的经验证据结论相反，中国加入 WTO 后按照世贸组织要

求不仅降低关税还要减少补贴，降低关税可能会增加产量和污染，但是补贴的减少降低了其环境污染的影响；补贴的减少主要通过三个渠道影响污染，第一补贴减少资本集聚引起的污染，第二资本和劳动力将从污染密集高的企业转移到污染密集低的企业，第三减少补贴将生产集中在效率更高的企业可能增加产量和污染，前两项机制作用大于第三项机制。Kelly（2009）拓展竞争性一般均衡动态模型研究政府补贴的环境效应，排放补贴、产出补贴和利息补贴都会在稳态下增加排放量，排放补贴直接增加了排放动力，因此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最大，产出补贴将生产转移到排放密集型补贴部门导致排放量可能会上升，利息和直接补贴扭曲了企业投入减少了边际产品的排放量，对污染的相对危害较小。无论那种补贴都提高了企业排污强度，从而增加了整个社会的平均排放强度和环境质量的机会成本，导致均衡状态下的排放量上升。Kelly（2009）研究还发现补贴影响环境质量的三个机制：资源再分配效应、资本积累效应以及补贴如何影响环境质量的机会成本（即环境质量的边际机会成本和边际收益），其中补贴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将生产集中在低效率的行业，补贴强化资本需求效应导致资本过度积累而增加排放，补贴会减少可利用的总资源，提高固定排放量的利率，从而提高环境质量的机会成本（放弃消费或者储蓄）；如果环境质量和消费是互补的，那么较高的利率就会导致环境质量的边际收益下降。就全球污染排放而言，理想情况下是各国的边际减排成本应该相等，但是各国在实现既定减排目标任务的自愿执行程度是无法协调的；另一方面虽然减排技术能够减少企业排放，但是各国之间存在环境政策是不平衡的。

对于大多数类型的污染，现有的补贴对减排技术使企业能够以较少的排放量生产。Fisher（2012）研究应该给予上游或者下游产业哪个环节补贴从而可以实现减少污染的目标，研究结论证实政府对上游产业补贴比下游产业补贴具有更强的减排效应，主要的原因在于针对上游产业的补贴强化了减排技术的供给，从而降低了减排技术的价格，同时不会造成排放向其他国家“漏出”的现象，而如果针对下游产业的补贴则相对于刺激了对减少排放需求，导致降低污染减排技术价格的提升，并且会造成污染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转移或露出现象，而针对上游产业的补贴则刺激了减排技术供应、降低了污染减排技术的价格。上游补贴改善了工业环境绩效，这一结论与 Golombek and Hoel（2004）的结果相似，如果技术外溢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成本，工业化国家的研发投资可能会减少发展中国家的排放。Main（2013）提出了线性需求和供给模型，并通过数字模拟探讨了对污染产业征税与对非污染产业补贴之间的权衡。占华（2016）和曹兰英（2017）从博弈模型视角政府补贴对于环境污染影响，占华（2016）借助国内与国外两个层次的博弈过程，证实了政府对污染密集型企业的补贴有利于企业购买清洁设备，从而降低减少污染排放量，实现减排目标；曹兰英（2017）通过博弈模型和案例分析，政府补贴能够正向促进企业污染防治努力水平，企业环境效益的提升带动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步提高。徐晓亮（2018）、徐晓亮和许学芬（2020）构建包含清洁部门和非清洁部门的动态 CGE 模型，模拟国家和地方不同清洁能源补贴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补贴能够降低单位 GDP 能耗，国家与地方对产业的干预能够有效发挥

其环境效益。

2. 产业政策与环境污染的实证研究

学者们倾向于认为政府补贴工具有助于环境改善 (Porter, 1995; David, 2010; Horbach, 2012), 政府补贴具有环保效应。Leuz (2006)、吴文峰 (2009)、Niessen (2010) 等分别以印度尼西亚、中国和德国的企业为样本, 验证获得政府补贴的企业往往具有更好的环境绩效。卢洪友等 (2019) 认为财政补贴显著增强了企业的环境责任意识, 促进了企业的环保投资。曹翔等 (2021) 对自贸试验区的环境效应进行量化评估, 发现自贸试验区所在城市通过经济扩大、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改善了环境污染。也有学者指出, 更环保的企业才能获得政府补贴, 政府补贴多少与污染排放程度负相关 (李溪, 2017)。而 Bajona and Kelly (2012) 通过 1997 年中国数据研究发现污染对减少补贴的反应比对降低关税的反应更具有弹性, 因此关税降低 5% 会使污染排放物的排放量增加 1%。而补贴减少 5% 会使污染量减少 1.8-11.6%, 污染量的减少取决于污染物, 补贴的减少影响到受补贴企业的生产份额、总产量、贸易条件和资本积累, 每一项都会对污染产生影响。何凌云等 (2020)、姜英兵和崔广慧 (2019) 研究认为不同产业政策工具对环境影响具有明显差异, 据五年规划中提到“支持”“鼓励发展”“重点发展”“大力发展”同时提及“环保”“绿色”“脱硫”“高效清洁”等环保词汇识别是否受到环保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 以沪深 A 股重污染上市公司为微观样本检验环保产业支持通过压力效应与激励效应加大企业环保投资; 企业环保投资能够有效降低污染排放; 银行信贷和政府补助强化企业环保投资进而抑制工业污染排放 (姜英兵和崔广慧, 2019), 可能的原因在于政府补贴产业政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 M 型关系, 低利率贷款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倒 U 型关系, 低利率贷款与企业绿色创新呈线性促进关系, 其中政府补贴类产业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作用最显著, 而低利率贷款的作用最小 (何凌云等, 2020)。余壮雄等 (2020) 立足于中央与地方五年规划中提及的重点产业政策对碳排放具有倾向性差异, 通过 1998 年-2015 年制造业碳排放数据构建政策扶持对地区碳排放的倾向性指标, 研究发现, 地区产业规划对高碳排放行业的扶持能够有效降低地区的碳排放倾向, 但是中央产业规划对地区碳排放强度并不显著。地方政府选择性扶持重点产业, 能够提升行业的工业增加值, 降低行业碳排放强度; 尽管高排放企业的碳排放水平更高, 但是地方政府所扶持行业的碳排放下降最终导致整个地区的碳排放强度下降。

产业政策中的补贴对环境的影响存在企业异质性。有关实证文献发现与私营企业相比, 对国有企业的补贴造成环境危害更大。Pargal and Wheeler (1996) 发现, 控制企业年龄、规模大小和企业效率之后, 印度尼西亚的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污染更严重。Dasgupta et al. (2001) 发现, 中国国有企业在环境规制方面比私营企业拥有更多的讨价还价能力, 因此中国国有企业的排放密集度是私营企业的数倍 (Wang and Jin, 2002; Bajona and Kelly, 2012)。Gupta and Saksena (2002) 发现印度存在同样的情况, 印度国有企业环境合规性的监测较少。Hettige et al. (1996) 的调查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果。然而, Earnharts and Lizal (2002) 发现捷克共和

国私有化的公司中，排放强度和国有所有权百分比之间存在着相反的关系。也有就企业性质与污染排放结论不一致的情况，Wangs and Wheeler（2005）认为发国有和非国有工厂之间的排放强度没有显著差异，姜英兵和崔广慧（2019）通过中国上市环保公司数据证实，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面临更大的环境规制成本，获得政府补贴和政策优惠能通过压力效应和激励效应影响了国有企业环境治理。而卢洪友（2019）在研究中国上市公司重污染企业得出相反的结论，政府补贴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带动作用更显著，产业政策对扶持企业的环境表现不一可能源企业的环保治理掺杂价值创造动机和企业管理层自立动机（崔广慧和姜英兵，2020）

国内学者还关注了产业政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竞争力关系，李振洋和白雪洁（2020）利用制造业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鼓励型政策、限制型产业政策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深入分析政府如何采取“鼓励+限制”政策组合的协同作用。研究发现，鼓励型重点产业政策没有发挥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限制型环境规制政策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即限制型环境规制程度达到一定的门槛值，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才能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鼓励型与限制型产业政策在严格的环境规制水平下能够有效促进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李振洋和白雪洁（2021）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选择性产业政策抑制了制造业绿色竞争力提升，这种负面影响存在区域和行业技术异质性，选择性产业政策并不能有效提升东部和中部绿色竞争力，而且对高、低技术制造业绿色竞争力存在负面影响。政府治理转型程度的提高能够缓解选择性产业政策的负面作用。孟祥宁和张林（2018）研究中国装备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 V 型演化轨迹，技术进步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但是规模效率恶化制约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3.产业政策与环境污染的政策研究

从理论层面看，产业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着促进和抑制的双重作用，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外部性使得企业创新投入不足，政府通过政府补贴、税收减免和低利率贷款等产业政策对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给予支持，从而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但是也有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受资助的企业可能会直接用政府自主代替自身的研发投入，徐晓亮（2018）分析清洁能源补贴改革的关键因素，清洁能源补贴方案影响的差异性较大，较强的发放补贴改革能有效促进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改善 GDP 能耗，提高人均能源盈余，认为采用“国家+强地方”的清洁能源补贴改革方案设计更加有利于发挥其环境效应。徐晓亮和许学芬（2020）提出要注重不同类型能源不同政策协调性和差异性，短期以化石能源为主，长期而言，应逐步加大可再生能源补贴，有利于低碳转型和环境改善。余壮雄等（2020）认为地方政府对重点产业的支持能够提升地区工业增加值并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水平，需要政府在合理设定目标的条件下，优先发展某些特定行业，才能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产业政策需要与市场机制相协调，共同推进绿色经济发展。中央和地方政

府在产业政策选择上，具有明显不同的倾向性，中央产业政策着眼于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长期目标，而地方政府更关注的是短期内辖区经济增长，因此地方政府更有动机发展高产值的高排放的行业。平新乔等（2020）认为十四五中国降低碳排放强度主要难度在于北方 8 个高排放省份，想要实现减碳目标，一方面采用逐年下调的碳排放指标等行政性手段，还需要运用产业政策和微观政策，政府通过推行智能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等产业政策推进新技术革命，突破节能、低碳等关键技术。地方政府要继续实施扶助低排放的产业，支持低排放的新产业政策项目上马。胡鞍钢（2021）认为需要实现中国 2030 年前碳达峰目标，需要大幅度提高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制定高碳行业，如钢铁、有色金属、建材、水泥、石油化工等低碳化、绿色化的结构性改革专项方案，使绿色能源成为新兴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四）产业政策的社会效应

还有部分学者关注了产业政策的收入效应。江海潮（2007）认为产业政策具有规模机理、边际机理和风险激励功能。产业政策在实施过程，其实质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不断博弈与寻租过程，从而产生剩余分配效应、企业投资效应、政策传递效应、产出效益、收入效应、成本效应、社会福利效应和市场嬗变表演，诸多政策效应与市场激励共同调控经济实现市场均衡。不同市场条件下，政策干预产生的效应不同，只有结合具体市场状态、利益竞争偏好和政策实施互动才能确定政策的具体效应。林毅夫和陈斌开（2013）从理论上探讨了国家发展战略通过劳动力市场影响收入分配机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减少劳动力需求，进而降低了均衡工资和劳动者收入，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当政府遵循毕竞发展战略时，收入分配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持续下降。当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经济发展可能停滞，收入分配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 型特征，且稳态收入不平等程度高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城市化所需时间也更长，并利用中国 1978-2008 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城乡收入差距在产业政策倾斜下呈现下下降后上升的 U 型规律。白极星和周京奎（2018）利用中国制造业微观数据，检验了产业政策对企业收入效应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不同产业政策对企业职工工资收入效应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即存在产业政策异质性，同一产业政策对不同类型企业（企业规模、企业成长阶段及国有股权比例）工资收入效应的影响也存在明显差异，即企业异质性；产业政策通过行业激励来促进企业工资收入提高的效果好于激励单个企业；产业政策在地区-行业间的资源配置离散程度越高，企业职工工资收入的扩展边际比集约边际提升效应越明显。此外，在竞争性产业政策资源重配机制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下，通过企业工资收入的扩展边际，竞争性产业政策对企业工资收入的提升效果更好。

四、产业政策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一）市场与政府关系对产业政策效应的影响

市场失灵是政府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理论依据（小宫隆太郎，1988；江小涓，1996；林毅夫，2012；Andreoni and Scazzieri，2014；Stiglitz et al.，2013；2015）政府技术创新与扩散、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等反面发挥作用。质疑产业政策的学者认为政府存在失效（Pack and Saggi，2006；江飞涛和李晓萍，2010；Lall，2013；张维迎，2016），市场发现与选择机制优于政府，在产业政策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委托代理问题、寻租腐败等实施成本和由此带来的扭曲成本。江飞涛和李晓萍（2010）梳理中国产业政策后指出，中国产业政策具有强烈的直接干预市场与限制竞争的管制特征，导致产能过剩、过度竞争和重复建设等问题。

针对学术界关于实施产业政策的理论争议与产业政策有效性质疑，Stiglitz and Greenwald（2014）、Rodrik（2008）打破产业政策的研究困境，指出有意义的方向是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更有效、如何实施产业政策更有效，研究重点应转向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与激励机制实现有效供给，具体探索产业政策实施路径与产业政策有效性边界（黄群慧，2018；侯方宇和杨瑞龙，2019）。政府与市场的协调效应是建立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基础之上，才能增强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洪永淼，2021），其中政治因素是不容忽视影响产业政策效果的重要部分（Chang，2011；Whitfield and Buur，2014）。孙铮等（200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干预较少的地区往往市场化程度、法治水平会比较高，同样在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政府干预市场的程度普遍较低（夏立军和方轶强，2005；孙早和席建成，2015）。钱雪松等（2019）、钟廷勇等（2019）均指出，产业政策对市场的干预效果受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产业政策干预市场的作用较弱，而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产业政策的干预程度会更高。政府与市场之间并非简单的二分法关系，市场的不完善为政府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经济效率提供了空间和可能，促进市场竞争的产业政策能够提升生产率和加成率（Aghion et al.，2015；戴小勇和成立为，2019）。韩永辉等（2017）认为政府与市场协同力量促进了产业升级，市场能够依据政府产业政策所传递的信号，加速资源要素向效率更高和潜力更好的企业流动配置。戴小勇和成立为（2019）研究发现，在行业差异化程度比较低的产业中，产业政策有利于市场竞争。张莉等（2019）发现重点产业政策会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加强市场竞争、消除要素扭曲有助于缓解该负面影响。钱爱民等（2015）发现在市场化进程较低的地区，政府补贴的投资效应更显著，而在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这种投资效应并不存在。

（二）中央与地方关系对产业政策效应的影响

长期以来，关于产业政策争论的焦点在于市场与政府角色与力量之争，上一小节文献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如何影响产业政策实施效果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为理解中国式产业政策提供了基础。随着府际关系、央地关系和地方政府竞争文献丰富，从政府与市场关系角度理解产业政策实施效果已略显不足。分权体制下央地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要因素，中国地方政府作为政府职能的实际履行者，中央政府通过增强制度供给、强化

制度执行政策，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就实施产业政策目标、选择产业政策工具不一致问题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因此本节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互动关系如何影响产业政策效果纳入分析框架。

关于地方政府对中央产业政策反应结论并未形成共识，吴意云和朱希伟（2015）认为产业政策执行过程遵循“中央舞剑、地方跟风”的发展模式，地方政府为积极争取中央政策的支持，将以中央产业政策为蓝本制定本地方重点扶持产业，而宋凌云和王贤彬（2013）则认为地方政府会采取因地制宜的重点产业策略，在实践操作中地方政府会更多倾向于具有本地优势的产业，而对于中央产业政策停留在形式拥护。张莉等（2017）研究发现，虽然重点产业政策总体上对地方政府出让工业用地的宗数和面积产生正向影响，地方政府对本地信息更加充分，因此地方政府会将更多的土地出让给地方重点产业政策扶持而非中央产业扶持的行业，这种地方政府差异性在东部沿海和高等级城市更明显。阳镇等（2021）从中央与地方分权关系发现，地方政府执行与中央政府匹配的产业政策有利于企业研发创新绩效，而中央与地方产业政策的不协同则将抑制企业创新投入。中国产业政策的传导依赖于地方政府，央地之间存在纵向的行政等级体系，地方政府掌握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存在较大差异（张莉等，2017），因此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宏观政策的反应不一。

熊瑞祥和王慷楷（2017）将地方政府竞争逻辑置于新结构经济学分析框架，指出这种央地不一致困境的原因，中央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具有理论上的合意性，地方政府在实践过程中所面临的激励与约束条件会扭曲这种合意性，为获得中央政府的政策倾向可能会竞相扶持与本地生产性结构不一致的产业，进而难以促进产业增长。面临晋升激励越强的地方，越倾向于响应中央政府鼓励发展的政策而忽视地方的比较优势。孙早和席建成（2015）、席建成和韩雍（2019）、曲创和陈兴雨（2021）通过构建中央与地方两极政府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发现从补贴角度分析中央与地方政府如何影响了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地方政府对产业政策的落实努力程度与中央政府的考核目标在“偏增长”和“重转型”之间的权衡密切相关，若中央政府对日益加强对经济转型的重视，地方政府在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的努力水平将会显著下降（孙早和席建成，2015）。席建成和韩雍（2019）认为经济上分权对产业政策实施效果具有负面影响，而政治上分权又弱化了经济分权的负面效应，产业政策实施效果取决于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的协调和平衡。曲创和陈兴雨（2021）指出中央政府明晰程度更高的产业政策得到的执行力度更强，因此产业政策效果愈明显；产业政策实现效果受到地区市场化水平和行业要素密集度影响；如果产业明晰度下降，地方政府会倾向于使用财税手段直接干预资源配置。

因此，黄群慧（2018）认为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有利于中央从整体促进产业合理布局 and 区域协调发展，同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考虑到地方竞争可能会影响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中央政府注重经济结构优化等多元发展目标，从源头上矫正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动机偏差（杨继东和罗路宝，2018）。

五、文献述评

综上所述，目前研究关于中国产业政策问题的相关研究文献已经非常丰富。学者们围绕产业政策与市场关系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关于产业政策效应相关研究遵循了两条主线来讨论，其一是从宏观视角关注产业政策对经济增长、产业升级以及产业生产率的影响，其二是从微观视角关注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主要涵盖了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投资、效率等方面，还涉及企业出口、融资并购等。然而关于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了环境污染还缺少关注，学者们从模型推演和实证检验为本文研究过程提供了直接的启示和借鉴。但对于产业政策的环境效应仍有进一步分析和拓展空间，具体表现在：

第一，以往研究没有关注到产业政策与污染排放的直接关系。既有文献研究中，学者们考察政府补贴或税收优惠等产业政策工具时，主要关注了其影响企业进行环境治理的动机、环保投资、环保意识等方面，忽视了产业政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一方面，产业政策促进了经济发展，推动了产业升级，提升了产业效率，势必会影响企业污染排放行为，对环境污染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是学术界经典话题，围绕展开的研究尚未深入关注经济发展背后产业政策的推动因素。如果忽视了产业政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势必不利于全面认识产业政策的政策效果，也不利于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

第二，以往研究忽视了产业政策在环境污染的微观影响。既有文献研究中，关注发达国家企业环境污染问题较多，关注中国企业环境污染问题多从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出发，上市公司代表了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企业，在样本选择方面具有一定偏差。中国环境污染与制造业迅猛发展密切相关，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聚焦到中国产业政策，仍需进一步深入分析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如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如何利用微观数据所包含的政策信息从始终角度对政策进行科学有效评估，从而更好地把握产业政策的脉络走向，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第三，以往研究尚未将市场与政府、中央与地方政府互动关系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研究产业政策的环境效应。中央产业政策的实施依赖于地方政府，而中国市场化推进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不充分，因此地方政府所掌握的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产业政策方面的反应并不一致。在中国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的背景下，地方政府被赋予了实施产业政策的自主权，政府间关系也产生了一定变化。在不同的政府关系特性下，对于中央政策，地方政府会采取不同执行策略，或配合中央政策发布相关产业政策措施，或采取不作为的方式应对中央政策。地方政府的采取补贴应对方式关乎地方发展的质量和效率，而这一举措在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且作用的效果受到企业特征、市场环境等的影响。不同层级政府发布的政策作用效果如何？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之间有何种关联？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是否存在着偏差？这些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很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1] Aghion P., Cai J., Dewatripont M., et al. Industrial Policy and Competition[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015,74,7(4):1-32.
- [2] Aiginger K. Making Ambitious Green Goals Compatible with Economic Dynamics by a strategic Approach[J]. Wwforeurope Working Papers, 2016.
- [3] Altenburg T., W. Lütkenhorst. Industrial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5.
- [4] Ambroziak, A : A theoretical concept of a modern industrial policy[J] , The New industrial policy of the European Union, Volumes 132–133, June 2015, Pages 54-55.
- [5] Amsden A.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 [6] Bajona, Claustre and Kelly, David L.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 with pre-existing subsidies: A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Elsevier,2012, 64(2):253-278.
- [7] Barde, J.P., and Honkatukia, O. Environmentally harmful subsidies[M]. The 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04/2005, 2004: 254-288.
- [8] Beason R., D.E, Weinstein. Growth, Economies of Scale and Targeting in Japan(1955-1990)[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6, 78(2):286-295.
- [9] Boeing, P. The Alloc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R&D Subsidies: Evidence from Listed Firm. Research Policy,2016,45(9):1774-1789.
- [10] Brandt, L., and Z. Zhu. Redistribution in a Decentralized Economy: Growth and Inflation in China Under Reform[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0, 108, 422-439.
- [11] Branstetter L, Sakakibara M. Japanese Research Consortia: A Microeconometric Analysis of Industrial Policy[J].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1998,46(2):207-233.
- [12] Bruce A. Blonigen. Industrial Policy and Downstream Export Performance[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16,126(9):1635–1659.
- [13] Chang, H.J. Industrial policy: Can We Go Beyond an Unproductive Confrontation?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Global: Lessons from East Asia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World Bank,2011.
- [14] Crespi F, Ghisetti C, Quatraro F. Taxonomy of Implemented Policy Instruments to Foster the Production of Green Technologies and Improve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J]. Wwforeurope Working Papers, 2015.
- [15] Dasgupta S., Laplante B., Mamingi N., Wang H., Inspections, pollution prices,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 Ecological Economics 36 (2001) 487–498.

- [16] David, M. Sinclair Desgagne B. Pollution Abatement Subsidies and the Eco-Industry[J].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10, 45(2): 271-282.
- [17] Earnhart D, Lizal L. Effects of ownership and financial status o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6(34): 111–129.
- [18] 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Affairs and Energy. National Industrial Strategy 2030: Strategic Guidelines for a German and European Industrial Policy[R], 2019.
- [19] Fisher, C.M., Greaker K. and Rosendashl, E. Emission Leaker and Subsidies for pollution Abatement. Pay the polluter or the Supplier of the Remedy?[J] Discussion Papers NO.708, Statistics Norway, Research Department, 2012.
- [20] Golombek, R. and Hoel, M., Unilateral Emission Reduction and Cross-Country Technology[J]. Advances in Economic Analysis Policy. 2004, 4(2): Article 3.
- [21] Greenwald B., Stiglitz J.E. Helping Infant Economies Grow: Foundation of Trade Polici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6, 96(2): 141-146.
- [22] Grossman G.M., Helpman E. 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J]. MIT Press Books, 1991, 1(2): 323-324.
- [23] Gupta, S., and S. Saksena, Enforcement of Pollution Control Laws and Firm Level Compliance: A Study of Punjab, India[J]. paper presented at 2nd World Congress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02, Monterey CA.
- [24] Hatta, T. Competition and Policy vs. Industrial Policy as A Growth Strategy, working paper, 2016.
- [25] Hausmann R, Rodrik D.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Self-discovery[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3, 72(2): 603-633.
- [26] Hettige, H., M. Huq, and S. Pargal, Determinants of Pollution Abate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J]. World Development, 1996, 24, 1891-1904.
- [27] Horbach, J., Rammer, C., Rennings, K. Determinants of Eco-Innovations by Type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The Role of Regulatory Push/Pull. Technology Push and Market Pull[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2, 78(32): 112-122.
- [28] Howell, Anthony. Picking 'Winners' in Space: Impact of Spatial Targeting on Firm Performance in China[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2020, (5): 1025-1046.
- [29] Jalil, A., Feridun, M. The Impact of Growth[J]. Energy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the Environment in China: A Cointegration Analysis. Energy Economics, 2011, 33(2): 284- 291.
- [30] John Beath. UK Industrial Policy: Old Tunes on New Instruments?[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8(2): 221-239.
- [31] Johnson, C.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M].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32] Kelly, D.L., Subsidies to Industry and the Environment[J].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4999, 2009.
- [33] Kim J I, Lau L J. 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of the East Asian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J].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4, 8(3):235-271.
- [34] Krueger A.O and Tuncer B.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Infant Industry Argument[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2, 72(5): 1142-1152.
- [35] Krugman P. What Ever Happened to Asian Miracle?[J]. Fortune, 1997, 136(4):26-29.
- [36] Lall, S. Industry Policy: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Promoting Industrial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J]. UNCTAD Review, 1994.
- [37] Lall, S., Reinventing Industrial Strategy: The Role of Government Policy in Building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3, 14(2):767-811.
- [38] Lall, S., Selective Industrial and Trade Polic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ssue[J]. The Politics of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y in Africa World Press and IDRC, 4(14), 2004.
- [39] Lawrence, R.Z. and Weinstein, D.E. Trade and Growth: Import-led or Export-led? Evidence from Japan and Korea. NBER working paper No.7264, 1999.
- [40] Lee, J., I. Clacher and K. Keasey. Industrial Policy as an Engine of Economic Growth: a Framework of Analysis and Evidence from South Korea(1960-1996)[J]. Business History, 2012, 54(5):713-740.
- [41] Lin, J.Y., and Rosenblatt, D., Shifting Pattern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Rethinking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 2012, 15(3):171-194.
- [42] Little, Ian M.D. Economic Development[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 [43] Liu, E. Industrial Policies in Production Network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9, 134(4): 1883-1948.
- [44] Main, R.S., Subsidizing Non-Pollution Goods vs. Taxing Polluting Goods For Pollution Reduction[J]. Atlantic Economic Journal, 2013, 41:349-262.
- [45] Malerba F. Sectoral system of innovation and production[J]. Research Policy, 2002, 31(2).
- [46] Mao Jie, Shiping Tang, Zhiguo Xiao, Qiang Zhi, “Industrial Policy Intensity,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 , Research Policy[J], 2021, 50, <https://doi.org/10.1016/j.respol.2021.104287>.
- [47] O’Sullivan E, Andreoni A, Lopez-Gomez C, et al. What is new in the industrial policy? A manufacturing systems perspective[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013, 29(2).
- [48] OECD. Objectives and Instruments of Industrial Policy: A Comparative Study[R]. Paris: OECD Press, 1975.
- [49] Pack, H., and K. Saggi. Is there a Case for Industrial Policy? A Critical Survey[J].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06, 21(2):267-297.

- [50]Page, J., and F. Tarp.,2017. The Practice of Industrial Policy: Government-Business Coordination in Africa and East A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 [51]Pargal, S., and D. Wheeler. Informal Regulation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Indonesia[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6, 104:1314-1327.
- [52] Porter, M. E., Linde, C. V. Green and Competitive: Ending the Stalemate[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9, 28(6): 128-129.
- [53]Restuccia, D., Rogerson, R. Policy Distortions and Aggregate Productivity with Heterogeneous Establishments[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2008, 11(4): 707-720.
- [54]Robinson, J.A. Industri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 A Political Economics Economy Perspective[R].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09.
- [55]Rodrik D. Industrial Polic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J]. Cepr Discussion Papers, 2004.
- [56]Rodrik Dani. Coordination Failures and Government Policy: A Model with Application to East Asia and Eastern Europ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6(40):1-21.
- [57]Sharp, M. What is Industrial Policy and why is it Necessary? [J]. Paper prepared for TSER project 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Broad Industrial Policy, May 1998.
- [58]Stiglitz, J.E. Industrial policy,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J]. WIDER Working Paper Series,wp-2015-149. <https://www.wider.unu.edu/sites/default/files/wp2015-149.pdf>
- [59]Van Beers, C., and J. C. van den Bergh. Perseverance of Perverse Subsidies and their Impact on Trade and Environment[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1, 36, 475-86.
- [60]Wade R.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 [61] Wang H, Wheeler D., Financial incentives and endogenous enforcement in China's pollution levy system[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5(49) :174–196.
- [62]Wang, H. and Y. Jin. Industrial Ownership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J] Discussion Paper 2936,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02.
- [63] Wang, Y. and Y. Zhang. Do State Subsidies Increase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Spending?[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2020,72:
- [64]Warwick, K. Beyond Industrial Policy: Emerging Issues and New Trends[J] OEC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Policy Papers, No.2, 2013.
- [65] Whitfield, L. and L. Buur.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Policy: Ruling Elites and Their Alliances. Third world Quarterly,2014,35(1):126-144.
- [66]埃兹拉·沃格尔.日本的成功与美国的复兴[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5.
- [67]白极星,周京奎.产业政策、异质性与收入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数据的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8,40(05):45-56.
- [68]白让让.竞争驱动、政策干预与产能扩张——兼论“潮涌现象”的微观机制[J].经济研究,2016,51(11):56-69.
- [69]曹兰英.基于博弈模型探索政府对企业治污财政补贴的优化[J].人文杂志,2017(06):60-67

- [70] 曹翔,马莉,董保民.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环境效应及其作用机制[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2.
- [71] 陈斌开,林毅夫.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J].中国社会科学,2013(04):81-102+206.
- [72] 陈登科.贸易壁垒下降与环境污染改善—来自中国企业污染数据的新证据[J].经济研究,2020,55(12):98-114.
- [73] 陈璐怡,周蓉,钟文沁,王丹,周源,薛澜.绿色产业政策与重污染行业高质量发展[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1,31(01):111-122.
- [74] 陈钊,熊瑞祥.比较优势与产业政策效果—来自出口加工区准实验的证据[J].管理世界,2015(08):67-80.
- [75] 陈志斌,范圣然.政府质量、市场化程度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来自后金融危机时期的经验证据[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5,30(02):52-60.
- [76] 崔广慧,姜英兵.环保产业政策支持与企业环境治理动机——基于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审计与经济研究,2020,35(03):111-120.
- [77] 戴小勇,成力为.产业政策如何更有效:中国制造业生产率与加成率的证据[J].世界经济,2019(03):69-93.
- [78] 范蕊,余明桂,陈冬.降低企业税率是否能够促进企业创新?[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0(04):74-84.
- [79] 郭飞,马睿,谢香兵.产业政策、营商环境与企业脱虚向实——基于国家五年规划的经验证据[J].财经研究,2022,48(02):33-46+62.
- [8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政策专题研究组.我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J].计划经济研究,1987(05):1-12.
- [81] 韩超,肖兴志,李姝.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绩效:不同政策与作用路径是否存在影响差异?[J].财经研究,2017,43(01):122-133+144.
- [82] 韩凤芹,陈亚平.税收优惠真的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吗?——来自高新技术企业15%税收优惠的证据[J].中国软科学,2021(11):19-28.
- [83] 韩乾,洪永淼.国家产业政策、资产价格与投资者行为[J].经济研究,2014,49(12):143-158.
- [84] 韩永辉,黄亮雄,王贤彬.产业政策推动地方产业结构升级了吗?——基于发展型地方政府的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J].经济研究,2017,52(08):33-48.
- [85] 何凌云,黎姿,梁宵,祝婧然.政府补贴、税收优惠还是低利率贷款?——产业政策对环保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比较[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06):42-58.
- [86] 何文韬,肖兴志.进入波动、产业震荡与企业生存——中国光伏产业动态演进研究[J].管理世界,2018,34(01):114-126.
- [87] 洪俊杰,张宸妍.产业政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机制和福利效应[J].世界经济,2020,43(11):28-51.
- [88] 侯方宇,杨瑞龙.产业政策有效性研究评述[J].经济学动态,2019(10):101-116.

- [89]侯方宇,杨瑞龙.新型政商关系、产业政策与投资“潮涌现象”治理[J].中国工业经济,2018(05):62-79.
- [90]胡凯,刘昕瑞.政府产业投资基金的技术创新效应[J].经济科学,2022(01):36-49.
- [91]花贵如,周树理,刘志远,靳光辉.产业政策、投资者情绪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J].财经研究,2021,47(01):77-93.
- [92]黄群慧,平新乔,李实,洪永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笔谈[J].经济学动态,2021(08):3-16.
- [93]黄群慧.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产业发展与工业化进程[J].中国工业经济,2018(09):5-23.
- [94]黄少卿,郭洪宇.产业政策的目标:增强市场竞争秩序—基于政府与市场关系视角[J].学习与探索,2017(04):105-111+176+2.
- [95]黄先海,宋学印,诸竹君.中国产业政策的最优实施空间界定—补贴效应、竞争兼容与过剩破解[J].中国工业经济,2015(04):57-69.
- [96]江飞涛,李晓萍.直接干预市场与限制竞争:中国产业政策的取向与根本缺陷[J].中国工业经济,2010,(09):26-36.
- [97]江飞涛,沈梓鑫.全球产业政策实践与研究的新进展——一个基于演化经济学视角的评述[J].财经问题研究,2019(10):3-10.
- [98]江飞涛等.理解中国产业政策[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
- [99]江海潮.产业政策激励、产业剩余分配与产业政策效应[J].产业经济评论,2007(2):105-123.
- [100]江小涓.经济转轨时期的产业政策—对中国经验的实证分析与前景展望[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 [101]江小涓.中国推行产业政策中的公共选择问题[J].经济研究,1993(06):3-18.
- [102]姜英兵,崔广慧.环保产业政策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基于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改革,2019(02):87-101.
- [10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环境绩效评价[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
- [104]黎文靖,郑曼妮.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宏观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6,51(04):60-73.
- [105]李力行,申广军.经济开发区、地区比较优势与产业结构调整[J].经济学(季刊),2015,14(03):885-910.
- [106]李溪.政治关联、财政补贴与企业环境绩效[J].财会通讯,2017,(18):40-44.
- [107]李振洋,白雪洁.产业政策如何促进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鼓励型政策和限制型政策协同的视角[J].产业经济研究,2020(06):28-42.
- [108]李振洋,白雪洁.地方选择性产业政策促进制造业绿色竞争力提高了吗—基于政府治理转型视角的考察[J].经济问题探索,2021(03):165-180.
- [109]李政,杨思莹,路京京.政府补贴对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J].经济管理,2019,41(03):5-20.
- [110]林毅夫,陈斌开.发展战略、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J].经济学(季刊),2013,12(04):1109-1140.
- [111]林毅夫等.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 [112] 刘鹤,杨伟民.中国的产业政策—理念与实践[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 [113] 卢洪友,邓谭琴,余锦亮.财政补贴能促进企业的“绿化”吗?—基于中国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研究[J].经济管理, 2019. 41(04): 5-22.
- [114] 马本,郑新业.产业政策理论研究新进展及启示[J].教学与研究,2018(08):100-108.
- [115] 迈克尔·波特,竹内广高,原鞠子.日本还有竞争力吗? [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1.
- [116] 毛其淋,许家云.政府补贴对企业新产品创新的影响——基于补贴强度“适度区间”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5(06):94-107.
- [117] 毛其淋,赵柯雨.重点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了企业出口—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微观证据[J].财贸经济,2021,42(11):131-145.
- [118] 孟祥宁,张林.中国装备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演化轨迹及动力[J].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8. 39(1):105-115.
- [119] 南亮进.日本的经济的发展[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
- [120] 彭伟辉,宋光辉.实施功能性产业政策还是选择性产业政策?—基于产业升级视角[J].经济体制改革,2019(05):88-96.
- [121] 钱爱民,张晨宇,步丹璐.宏观经济冲击、产业政策与地方政府补助[J].产业经济研究,2015(05):73-82
- [122] 钱雪松,康瑾,唐英伦,曹夏平.产业政策、资本配置效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2009年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自然实验的经验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8(08):42-59.
- [123] 曲创,陈兴雨.“上下兼顾”的地方政府与产业政策效果——基于政策明晰性的研究视角[J].经济评论,2021(03):37-53.
- [124] 邵朝对.进口竞争如何影响企业环境绩效—来自中国加入 WTO 的准自然实验[J].经济学(季刊),2021,21(05):1615-1638.
- [125] 邵敏,包群.政府补贴与企业生产率——基于我国工业企业的经验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2(07):70-82.
- [126] 邵伟,季晓东.选择性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资本流动?——基于开发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J].产业经济研究,2020(06):43-54
- [127] 世界银行: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
- [128] 宋凌云,王贤彬.产业政策的增长效应:存在性与异质性[J].南开经济研究,2016(06):78-93.
- [129] 宋凌云,王贤彬.产业政策如何推动产业增长—财政手段效应及信息和竞争的调节作用[J].财贸研究,2017,28(03):11-27.
- [130] 宋凌云,王贤彬.重点产业政策、资源重置与产业生产率[J].管理世界, 2013(12):63-77.
- [131] 苏丹妮,盛斌.产业集聚、集聚外部性与企业减排—来自中国的微观新证据[J].经济学(季刊),2021a,21(05):1793-1816.
- [132] 苏丹妮,盛斌.出口的环境效应:来自中国企业的微观证据[J].国际贸易问题,2021b(07):142-158.

- [133] 苏丹妮,盛斌.服务业外资开放如何影响企业环境绩效—来自中国的经验[J].中国工业经济,2021c(06):61-79.
- [134] 苏丹妮.全球价值链嵌入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环境绩效?[J].南开经济研究,2020(05):66-86
- [135] 孙文浩,张杰,康茜.减税有利于高新技术“僵尸企业”的创新吗?[J].统计研究,2021,38(06):102-115.
- [136] 孙早,席建成.中国式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产业升级还是短期经济增长[J].中国工业经济,2015(07):52-67.
- [137] 孙铮,刘凤委,李增泉.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05,(05):52-63.
- [138] 汪海建,薛云燕,周绍杰.“去产能”政策是否提高公司绩效—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2,42(01):51-66.
- [139] 王克敏,刘静,李晓溪.产业政策、政府支持与公司投资效率研究[J].管理世界,2017(03):113-124+145+188.
- [140] 吴利华,申振佳.产业生产率变化:企业进入退出、所有制与政府补贴——以装备制造业为例[J].产业经济研究,2013(04):30-39.
- [141] 吴伟伟,张天一.非研发补贴与研发补贴对新创企业创新产出的非对称影响研究[J].管理世界,2021,37(03):137-160+10.
- [142] 吴文锋,吴冲锋,芮萌.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税收优惠[J].管理世界,2009,(03):134-142.
- [143] 吴武清,赵越,田雅婧,苏子豪.研发补助的“挤入效应”与“挤出效应”并存吗?——基于重构研发投入数据的分位数回归分析[J].会计研究,2020(08):18-37.
- [144] 吴意云,朱希伟.中国为何过早进入再分散:产业政策与经济地理[J].世界经济,2015,38(02):140-166.
- [145] 席建成,韩雍.中国式分权与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理论及经验证据[J].财经研究,2019,45(10):100-111.
- [146] 下河边淳,管家茂.现代日本经济事典(中译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 [147] 夏立军,方轶强.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05,(05):40-51.
- [148] 小宫隆太郎,奥野正宽,铃村兴太郎.日本的产业政策[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 [149] 筱原三代平.产业结构与投资分配[J].一桥大学经济研究,1957(6).
- [150] 谢获宝,黄大禹.地方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政府行为视角下的中国经验[J].东南学术,2020(05):104-116.
- [151] 熊瑞祥,王慷楷.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产业政策与资源配置效率[J].经济评论,2017(03):104-118.
- [152] 徐保昌,谢建国.政府质量、政府补贴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经济评论,2015(04):45-56+69

- [153] 徐浩,张美莎,李英东.银行信贷行为与产能过剩——基于羊群效应的视角[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41(07):47-61.
- [154] 徐晓亮,许学芬.能源补贴改革对资源效率 and 环境污染治理影响研究—基于动态 CGE 模型的分析[J].中国管理科学,2020,28(05):221-230.
- [155] 徐晓亮.清洁能源补贴改革对产业发展和环境污染影响研究—基于动态 CGE 模型分析[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8,20(05):44-57+86.
- [156] 徐晓亮.清洁能源补贴改革对产业发展和环境污染影响研究—基于动态 CGE 模型分析[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8,20(05):44-57+86.
- [157] 阳镇,陈劲,凌鸿程.相信协同的力量:央-地产业政策协同性与企业创新[J].经济评论,2021(02):3-22.
- [158] 杨继东,罗路宝.产业政策、地区竞争与资源空间配置扭曲[J].中国工业经济,2018(12):5-22
- [159] 杨露鑫.政府补贴对地区生产率的影响评估[J].财政科学,2021(01):22-33.
- [160] 杨汝岱,朱诗娥.产业政策、企业退出与区域生产效率演变[J].学术月刊,2018,50(04):33-45.
- [161] 杨晓妹,刘文龙,王有兴.政府创新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兼论补贴合理区间[J].财贸研究,2021,32(10):70-83.
- [162] 于建忠,陈燕红.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门槛效应——基于融资约束差异的视角[J].浙江社会科学,2021(10):12-22+155.
- [163] 余典范,王佳希.政府补贴对不同生命周期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J].财经研究,2022,48(01):19-33.
- [164] 占华.博弈视角下政府污染减排补贴政策选择的研究[J].财贸经济,2016(04):30-42.
- [165] 张川川.中国的产业政策、结构变迁和劳动生产率增长 1990-2007[J].产业经济评论,2017(04):17-33.
- [166] 张莉,朱光顺,李世刚,李夏洋.市场环境、重点产业政策与企业生产率差异[J].管理世界,2019,35(03):114-126.
- [167] 张莉,朱光顺,李世刚,李夏洋.市场环境、重点产业政策与企业生产率差异[J].管理世界,2019,35(03):114-126.
- [168] 张龙鹏,汤志伟.产业政策的资源误置效应及其微观机制研究[J].财贸研究,2018,29(12):1-13.
- [169] 张鹏杨,朱光,赵祚翔.产业政策如何影响 GVC 升级—基于资源错配的视角[J].财贸研究,2019,30(09):67-78+100.
- [170] 张维迎.我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与林毅夫辩[J].比较,2016(6):174-202.
- [171] 赵卿,曾海舰.产业政策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了吗?[J].经济体制改革,2020(04):180-186.
- [172] 赵婷,陈钊.比较优势与产业政策效果:区域差异及制度成因[J].经济学(季刊),2020,19(03):777-796.

- [173] 赵婷,陈钊.比较优势与产业政策效果:区域差异及制度成因[J].经济学(季刊),2020,19(03):777-796.
- [174] 郑安,沈坤荣.自主创新、产业政策与经济增长[J].财经科学,2018(06):39-52.
- [175] 周建军.美国产业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从产业技术政策到产业组织政策[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01):80-94.
- [176] 周林,杨云龙,刘伟.用产业政策推进发展与改革——关于设计现阶段我国产业政策的研究报告[J].经济研究,1987(03):16-24.
- [177] 周茂,陆毅,杜艳,姚星.开发区设立与地区制造业升级[J].中国工业经济,2018(03):62-79.
- [178] 周叔莲.产业政策问题探索[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87.
- [179] 周亚虹,蒲余路,陈诗一,方芳.政府扶持与新型产业发展——以新能源为例[J].经济研究,2015,50(06):147-161.
- [180] 周燕,潘遥.财政补贴与税收减免——交易费用视角下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分析[J].管理世界,2019,35(10):133-149.
- [181] 周振华.产业政策的经济理论系统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